中國有選擇嗎？

但昭偉
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教授
台灣人權學刊主編

在我心目中，黃默教授是個自由主義者，他認定普世價值的存在，也認定這些價值應透過社會和政治機制來落實。這些普世價值就是人權、自由、平等和正義，而憲政民主就是體現這些普世價值的社會及政治機制。黃默教授也是飽經世事的自由主義者，以他的歷練，他對這個世界及國際局勢的了解比許多人都熟稔。假如我對他個人立場的了解沒有太大的謬誤，那麼我就不得不說，黃默真的是個樂觀的自由主義者。

我這邊所說的樂觀，並不是說黃默像 Francis Fukuyama 一樣，相信「一個能體現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終將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出現」，而是他相信那樣的世界有機會出現，而那機會落在我們一般人和政治精英的手上（不管這些人生活在哪裡）。在他的這個信念中，他尤其寄望中國大陸的廣大眾生及政治精英。他似乎認為，一個新國際新秩序的打造，關鍵落在中國人的手上，雖然美國人也有一定要扮演的角色。

在黃默的這篇文章當中，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當下新冠疫情緊張、經濟成長不如預期（因此會損及政權的正當性）、俄烏戰爭延宕、美國對中國採取圍堵掣肘政策的情況下，中國大陸面臨三項抉擇。第一，繼續的挑戰以美國為首的霸權；第二，尋求多極的國際秩序，一方面維持中國在亞洲的優勢，同時與美國競爭亞洲國家的支持（尤其是東南亞國家），另一方面遂行一帶一路的既有政策；第三，與西方世界攜手合作，共謀一個具包容性的（inclusive）、開放的（open）、及公平的（fair）世界秩序。

不難想見的，黃默推薦中國大陸的選擇是第三個。第一個選擇會冒者大戰的危險，而在這可能的戰爭當中，許多國家會捲入（包括台灣），沒有人會是贏家。第二個選擇是許多政治現實主義者（例如：John Meresheimer）預測會

發生的，也似乎是中國曾經希望的多極國際秩序；但如此的選擇起碼會碰到兩個問題，一是美國會接受這樣的秩序嗎？二是這樣的國際秩序不會是穩定的秩序，戰爭及強權的衝突仍然沒有消弭。在第一個選擇及第二個選擇都不是最佳選項的前提下，第三個選擇於是成了黃默心中的最佳選項。黃默當然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。他告訴我們，假如中國做了這個選擇，而美國也願意接受，中美之間就會有長時間、也絕不簡單的協商與交涉，只有如此，那個美好的世界秩序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
我對黃默所提中國可能有的前兩個抉擇並不完全的清楚。根據上述，中國可能的第一個選擇是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。我不十分明白的是：中國在挑戰美國霸權時，其所期望的結果究竟為何？是取而代之而成為世界新霸主呢？還是與美國平分秋色的形成一個二極國際秩序（就像以往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對峙一樣）。根據黃默的說法，中國所可能面對的第二個抉擇是多極的國際秩序。但我不清楚的是，在這個多極的國際秩序中，美國的角色為何呢？是一個不得不以美國為大的多極國際秩序呢？還是一個眾多強權平起平坐的多極國際秩序呢？這多極秩序是以集團或是單一國家的方式出現呢？由於我的不清楚，所以我逕自的把那第一個抉擇視之為「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，希望在短期能與美國分庭抗禮，長期則能成為世界新霸主」。也自以為是的把第二個抉擇解讀為「那多極的國際秩序並不是以美國為大的秩序，而是一個沒大沒小、大家平起平坐的國際秩序」。

面對黃默所指出中國的三個選擇，我還有一個地方並不是那麼的清楚。我懷疑中國的人民和政治精英真的有如他所說的那三個抉擇嗎。黃默的論述似乎肯定了中國人民和政治精英有機會去做選擇，但從德國社會學家魯曼（Niklas Luhmann）的觀點來看，中國人民乃至政治精英的想法或行動，是其所處的社會系統造就出來的結果。美國史學家 Stephen Kotkin 也認為，是中國共產黨體制把習近平挑選了出來，成了國家領導人，而不是習近平馴服了中國共產黨體系，從而成為了國家領導人。依照他們兩位的想法，表面上看起來，一般人或政治精英似乎有選擇的空間和可能，但實際上，我們所處的社會系統自有其內在的動能及運作邏輯，是這動能或邏輯驅使我們人（不論我們是否為政治精

英）做了抉擇，而不是我們的自由意志讓我們刻意的去做特定的選擇。我在這裡的疑惑是一個形上學的問題（決定論 vs. 自由意志的問題），但在這裡，我沒有深入討論的企圖。

黃默的這篇文章還給人另外一個可議的印象。由於這篇文章的主題聚焦於中國可以做的三種選擇，所以讀者會認為中國有主動選擇的餘地。從某個角度而言，中國的確可能有其主動性，但中國的選擇極有可能與美國的選擇有連動性。也就是說，中國會做什麼樣的選擇，可能會是因應美國所做的選擇而定。中國固然站在十字路口上，美國同樣的也杵在一個十字路口上。新冠疫情的餘波盪漾、俄烏戰爭帶來的核戰風險和諸多的不確定性、經濟民生的不安、後川普時代的政治紛擾、中國對美國單極霸權的挑戰，也同樣的迫使美國面臨重大的選擇。我們也可以說，美國所面臨的選擇有三個。第一，美國刻意的去箝制中國在科技、軍事、經濟、和外交上的繼續壯大，避免讓中國能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全球性霸權（這就是美國現在走的路）。第二，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，承認自己的國力不若以往，已不足以成為一個宰制全球的單一霸權，而去接受一個多極或二極的國際新秩序，而在那可能的多極世界當中，美國甚至只會扮演區域性霸權的角色（就像二次大戰之前）。第三個選擇，就是去參與一個包容的、開放的、及公平的國際新秩序的營造。再一次的，我猜想，若黃默要為美國和全球人類謀的話，那麼他可能也會認為，美國的最佳選擇應是上述的第三個選項。

在中國的選擇與美國的選擇有連動性的設定下，假如美國決定要維持全球性唯一霸權的現狀，那麼就必會提供中國去挑戰美國霸權的空間（試想中國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巨大潛能）。這是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，中國大概不會心甘情願的折服於美國（尤其是在台灣的問題上），中國因而會奮力的抗拒美國的霸權地位。而假如美國選擇去接受二極或多極的國際新秩序，那麼中國也就可能開心地去迎合黃默前述為中國謀的第二個選項，因為第一個選擇可能付出慘重的代價，第三個選擇不合中國的國情。假如美國要去營造一個包容的、開放的、公平的新國際秩序，我實在就不知道中國相對應的會做什麼樣的選擇。在美國有誠意的假定下，中國也有可能去做它的第三項選擇嗎？我很懷疑！但假

如中國不接受美國第三項的選擇，那也就會逼迫美國放棄它計畫中的選擇。

總之，我在這裡想要強調的是，中國的選擇極有可能是被動的，中國的選擇實際上可能是因應美國選擇的結果。當然，在某些情況之下，美國的選擇也可能是被動的，有可能是因應中國選擇之後的結果。

讓我回到主題。在黃默教授為中國設定的三個選項上，假如我們承認中國人或政治精英有主動的選擇權，那麼他們究竟會選擇哪一項呢？是前面所說的第三個選項嗎？這選項預設了中國要放棄它的民族主義、要它不要活在過去、要它不要一直想要去洗雪過去 200 年的國恥、要它不要沉溺在過去曾經偉大的事實、要它的領導班子不要操控民族主義的情懷、要它放棄共產黨的專制統治、要它不要利用最新的科技來進行社會控制及維護既有權力、要它去覺知「對人權及自由的侵犯」並不利於中國整體的發展及茁壯。假如中國與西方合作，去選擇一個具包容性的、開放的、公平的國際新秩序，就意味著要放棄中國共產黨種種的既成觀念和現行體制，我實在看不出中國和它的領導人物會去選擇那第三個選項。Stephen Kotkin 在很多嚴肅性的談話節目中一再強調，大陸中央黨校最關心的課題就是「蘇聯如何的瓦解及中國如何地不要犯下戈巴契夫的愚蠢錯誤」。

此外，假如中國決定去選擇那第三個選項，前提之一，是美國也要去做類似的選擇，否則就只有破局一途。但美國會去做這樣的選擇嗎？自 1990 年蘇聯解體以來，美國學者 Charles Krauthammer 就預言，一個美國成為全球唯一霸權的單極國際秩序已然成型。當蘇聯解體、中國尚未全然崛起，美國作為全球唯一霸權起碼已有 30 多年，要美國放棄它享受已久的世界唯一霸權地位，美國會肯嗎？再者，要美國放棄隱而未宣的白人優先種族主義是一件容易的事嗎？

在中美兩強很難放棄固有意識形態及既得權勢的狀況之下，要中美兩國去選擇前述所設想的第三個選項，會是一件難度極高的事，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話。

黃默當然知道那第三條路絕非輕鬆簡單，於是他要我們記取由小羅斯福總統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主導制定世界人權宣言的經驗。也許以過往成功的經

驗為參考，可以透過強國之間（以中美為主）的交涉、協商、和妥協，找出理想國際新秩序的基礎。黃默對讀者的提醒當然有言者諄諄之意，但聽者呢？會不會把這諄諄之言當作是耳邊風？在這裡，讓我們不要忘記，世界人權宣言的訂定是在二戰之後，當時有識之士反思人類遭遇到了莫大的浩劫，在災難結束伊始，特別有不讓歷史重來的強烈想法。世界人權宣言能夠出檯，實在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。這是不是說，只有在中美兩強爭霸，拼個你死我活之後，在殘垣敗瓦之中，大家才願意去選擇那理想的國際新秩序？

假如黃默所勾勒出來的第三個選項不是那麼容易，在短時間內也不易展開，一旦展開，其中橫亙的阻礙也不會少，那麼第二選項（也就是多極國際秩序）如何？之前也提過，這第二選項曾是中國想走的路，似乎也是正在努力的方向。但在美國獨霸全球的現有國際秩序之下，美國當下的目標是將中國阻絕削弱，使之成為區域性的霸權。在這種企圖下，美國會容許那多極新秩序的出現嗎？我覺得不會。除非美國的國力在新冠疫情、烏克蘭戰爭、及內部政局混亂的影響之下嚴重衰敗，否則美國不會輕易地接受那多極的國際秩序。美國頂多只會被迫接受與中國分庭抗禮的二極國際秩序。多極國際秩序可能還是遙遠將來的選項吧！所以，在美國不想讓多極國際新秩序出現的前提下，那中國所想做的第二項抉擇，也有其困難度。除非中國在短時間內迅速地讓國力全方位的壯大（中國的經濟成長在 2021 及 2022 年放緩，讓西方觀察家鬆了一口氣），否則第二選項的實現也會有如海市蜃樓。看起來就只剩下兩強爭霸的局面。

由此看來，中國似乎沒有什麼抉擇的空間。我認為在美國想強力削弱中國，而中國想奮力出頭的態勢下，兩國只能維持當下競爭又合作（尤其在氣候變遷上的合作）的現狀。而在那競爭的過程中，台灣在選邊站的遊戲裡，似乎很難不被美國緊緊攬住。這是因為和中國大陸的和談或一國兩制的接受似乎已不可能（想想香港的現狀），馬英九時代左右逢源的「親美和陸」政策，也不可能為中美兩國同時允許。

黃默的文章表面上寫的是中國所可能有的抉擇，骨子裡觸及到的是台灣面對的困境，而這正是他該提而未提的話題。